

一 追溯历史渊源 从日本寻根热说开来

一衣带水 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早在 2000 余年前 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就存在着友好的交往。由于古代中日交往长期属于地区性的，加上文字的出现较晚，所以不可能有更早的记录。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古老的书籍，成书于战国时代，秦汉时期又有所增补。此书是将民间众多神话传说汇编而成，历来有奇书之称。此书包含着有关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动植物、矿产、医药以及宗教等方面内容，具有极其丰富的文献史料价值。书中有多处涉及日本的记事，是中国古籍中有关日本列岛最早的文字记载，毋庸置疑地记录了源远流长的中日交往。

《山海经》的《海内北经》中有这样的记叙：“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从地理方位来说，“倭”指的就是日本列岛，这大体上是正确的。古人认为中国除分九州外，还有东、西、南、北海，即九州四海。东海指的就是现在的黄海、东海一带。《海内东经》一开始就明确这一区域包括的范围是“海内东北陬以南者”，接着指出：“巨燕在东北陬。”“燕”作为中国古国名称，指的就是现在的河北北部、辽宁西部。“盖”据历代的论证指的就是朝鲜半岛上的盖马。清朝郝懿行引用《汉书》考证认为“盖马疑本盖国

地’^①。至于“倭”，一般说来是中国古代对日本列岛上国家和民族的代称。在以后撰写的中国正史都是这样记载的。这些考证说明，《山海经》正确地记载了日本列岛“倭”的地理方位，指明它在中国的东北方向的大海之中，朝鲜半岛的东南，与中国古代燕国，即现在河北、辽宁大陆地区相距不远，以“一衣带水”来反映邻近关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山海经》的记载证实，至少在 2000 年前，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就开始有了频繁交往，不然不可能有这样准确的表述。在《汉书》的《地理志·燕地》中记载着：“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说明当时的“燕地”就存在着中日间的交往。事实上，这样的交往可追溯到更早以前。地质学家们所进行的考察研究证实，中国大陆东北部原来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相连，是一片一望无际的黄海平原，可以徒步通行。以后地壳变化形成了大海，日本列岛独立于海外，才造成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的局面。尽管古代生产技术落后，但片片木舟还是能往来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因此大海分割了大陆和列岛，并没有中断两地居民的交往联系。

《山海经》中有关“倭”——日本列岛与大陆一衣带水的叙述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的记载，它从地理方位这个侧面来反映中日人民源远流长的往来。至于“倭人”——日本人，他们的“根”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日本人民十分关心的，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受美国名著《根》的影响，日本掀起了一股寻“根”的热潮。那么，当今日本人在寻找什么根呢？佐佐木高明教授在他的一本名著中曾这样说：“本书所说的‘日本人’，并不只是指太古居住在日本列岛的人类。最早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古人的痕迹，在若

千万年前的洪积世地层中曾有几处发现。然而，我们不能立即认为这些洪积世人类就是和我们相处的日本人。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他们并不和我们说同样的日语，并不具有和我们同样的文化。即我们日本人在探索自己的根时，不能只追溯远古住在日本的人类，我们要寻求的应该是掌握了日本人的文化诸特征的直接祖先，也可以说是寻找日本文化的根。^①对此，日本的语言学界、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特别是民族学界，提出了诸如日本文化“北来说”、“南来说”、“南岛文化说”、“骑马民族说”、“复合文化说”等等文化源流论，其中“稻作文化说”、“照叶树林文化说”、“倭人起源于云南说”，则明确指出了日本文化与中国大陆的云南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因而在 70~80 年代，日本曾出现来我国云南寻根的热潮。

在我国云南寻根的热潮中，不少日本的学者和专家们在实地作了大量的调查，收集了许多素材，如住居、食物、服装、农耕礼仪、宗教信仰等方面，同时通过对大量的共同文化要素进行对比研究，从而论证了云南与日本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照叶树林文化说、稻作文化说，更突出的反映在倭人起源于云南说中。

倭人起源于云南说的最早提出者，日本大阪教育大学鸟越宪三郎教授曾撰写大批学术论文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从中国的《史记》和《汉书》中就可以知道，在公元前的长江上游流域，就有一些不同于中原汉族的其他民族国家，如滇、夜郎、邛都、蜀巴等等，从调查考察中发现日本人与这些民族有着相同的文化特征，可以说倭族的发祥地就在云南。这些民族从云南携带着水稻农耕和它特有的建筑文化，沿着江川河谷，从云南迁徙出来，有

^①照叶树林：《文化的道路——从不丹、云南到日本》，日本广播出版协会 1983 年版，第 3 页。

的到达长江流域，建立了吴国和越国，以后又向北部山东半岛扩展，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被称为“东夷”。而倭人就是从东夷地区携带着稻作农业文化到达日本的民族。

鸟越宪三郎教授的观点虽然是一家之言，在许多问题上与其他学者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但是“成为日本人的文化诸特征”是从中国大陆、更多的是通过江南传播到日本去的，这个说法则是没有疑义的。日本寻根热的掀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从日本文化根的来源这个侧面，反映了中日间的交往。

汉字东传 渡来人传授文化、生产技能

日本古籍《古语拾遗》中有这样的记载：（日本）“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在公元7世纪成书的中国正史《隋书》也有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的记载。因而，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要比中国晚。关于中日之间的交往和日本列岛上的一些历史情况，往往记载于中国古代的史书中。如《三国志·魏志》的《倭人传》，就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日本列岛上邪马台国的历史以及魏国和邪马台国交往的情况。它成为研究日本古代这段历史的唯一重要的历史文献。南北朝时期的《宋书》成书于公元488年，这部史书中的《倭国传》，翔实地记录了日本统一后的大和朝廷与南朝刘宋朝廷的密切来往，同时也记录了大和朝廷的历任统治者。《宋书·倭国传》的记载清楚地表明，在这个时期日本先后有五代倭王，这就是：赞、珍、济、兴、武。《梁书·倭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晋安帝时，有倭王赞。赞死，立弟弥。弥死，立子济。济死，立子兴。兴死，立弟武。”这里不同的是，赞和珍，《梁书》中称赞和弥。《宋书·倭国传》中保存倭五王的珍贵史料，它历来受到中外史学者的重视。公元5世

纪日本还没有文字，也就没有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宋书·倭国传》是日本这个历史时期唯一能作为依据的文字资料，确实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即使到了以后，日本也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中国史书中仍然记载着有关日本列岛上的情况及其与中国间的交往。

记载有日本情况的中国正史

正史名称	作者	志传名	称谓
后汉书	南朝宋 范曄	东夷	倭
三国志	西晋 陈寿	东夷	倭人
晋书	唐 房玄龄等	东夷	倭人
宋书	梁 沈约	蛮夷	倭国
南齐书	梁 肖子显	东南夷	倭国
梁书	唐 姚思廉	东夷	倭
隋书	唐 魏征等	东夷	倭国
南史	唐 李延寿	夷	倭国
北史	唐 李延寿	四夷	倭
旧唐书	后晋 刘昫等	东夷	倭国 日本
新唐书	宋 欧阳修等	东夷	日本
宋史	元 脱脱等	外国	日本国
元史	明 宋濂等	外国	日本
明史	清 张廷玉等	外国	日本

中国的汉字传入日本较早。在《后汉书·倭传》中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1784年春，在日本北九州地区福岡县志贺岛

上出土了一枚金质印章，刻有阴文三行五个汉字“汉委奴国王”，（古代“委”字和“倭”字通用）这与《后汉书》中的记载完全一致，说明早在公元 57 年，汉字就传入了日本。随着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交往的日趋频繁，一批又一批大陆上的中国人东渡到达日本列岛，他们在日本推广和传播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更重要的是教会日本人使用汉字、汉文，使汉字成为日本的最初文字。

关于传授中国的文化知识，在《日本书纪》中有一段王仁的传说：“（十五年八月）百济王遣阿直歧献上良马二匹。……阿直歧长于经典，为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某日，天皇问阿直歧：‘尚有高于子之人否？’答言：‘有王仁 博学多才。’……于是召请王仁。”“（十六年二月）王仁来。太子菟道稚郎子拜为师，随王仁研习诸典籍，无不通晓。”不少日本史书称王仁是文宗之祖。百济在朝鲜半岛。传说中的王仁就是居住在百济的汉人，这说明是东渡的汉人向日本人传授了中国的文字、文化。当时，在日本不仅上层统治阶级学习使用汉字，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学会应用汉字。据历史记载 公元 478 年倭王武给中国南北朝的宋国皇帝写的奏文，用的就是汉字。

从公元 5 世纪以后，日本人民开始以汉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传说到日本天平和平安时代才创造出一种片假名，一种平假名，慢慢有了日本自己的文字，这种文字都是从汉字演化过来的，有的也就是汉字。虽然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但直到公元 9 世纪，不少日本人仍然以汉字为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这个时期不少著名作品都是使用汉字、汉文书写成的。从公元 6 世纪中叶到 9 世纪末撰写成的《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三代实录》六部日本正史 总称《六国史》，全使用汉字、汉文，可见汉字对日本之深远影响。

在传播中国文化和生产技能方面，早期移居日本的中国人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传说中的徐福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传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乞求长生不老。海滨琅琊郡（今山东、江苏交界）人士徐福（即徐市）说，东海之中有仙岛，可以求得长生不老仙药。秦始皇大喜，派徐福率童男童女乘船出海采集仙药。这不仅是民间传说，中国古代的史书中也有记载。最早是司马迁所作《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写道：“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童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中的《淮南王列传》以及《三国志·吴书》等都有关于徐福入海求仙药的记载。《后汉书》中的《东夷传》写得更具体：“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20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上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台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虽然《后汉书》这段文字并没有说夷洲和澶洲就是日本或日本列岛的那一部分，但中日两国不少史学家都认为夷洲、澶洲就是日本列岛中的某个海岛。寺屋善雄所撰写的《中国传来物语》中《渡来人》一节，广泛介绍了在日本流传的有关徐福东渡日本的种种传说，因为徐福给日本带来了大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以及医药，被日本尊称为“司农耕神”、“司药神”。传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早在公元前后，就有中国人渡海到日本列岛定居，并传播文化和生产技术。在中国的历史上，在秦汉时期确实有大量汉族人，为逃避暴政，而到海外寻求乐土。《后汉书·东夷传》中有：“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为之，……故或名之为秦韩”。《三国志》中也有“陈胜、吴广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的记载。不少移

居朝鲜的汉族人大批渡海到达日本，被称为“渡来人”（过去称“归化人”）。据日本《应神纪》和《古语拾遗》记载，有弓月君率 120 县之民移居日本（传说弓月君是秦始皇之后裔）。日本研究中日关系的著名学者木宫泰彦教授认为，“大量秦人、汉人归化日本，他们的子孙大量繁衍，融合成为日本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民族史上来看是件重大的事，但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多的贡献。他们传播的文化上的影响，可能遍及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①事实正是如此，秦汉之际，中国的稻种、水稻耕作方法、青铜器、铁器以及冶炼铸造的技术等，通过渡来人陆续传到日本。以后又将养蚕、织绢、制陶以及制革等先进技能带到日本，特别是渡来的汉人把中国大陆上的《论语》、《千字文》等汉文书籍携带到日本，其中不乏长于文笔、汉文素养很高的人才，他们不仅向日本民族传授着文化知识，而且不少还供职于朝廷，掌管着记录，为朝廷起草文书，如倭王武的奏文，就可能是出自渡来人后裔之手笔。

遣隋唐使 唐风盛行日本列岛

公元 6 世纪末 中国结束南北朝分裂的局面 实现了统一 建立了隋朝。当时日本的摄政者圣德太子，为深入实现政治改革，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的交往，多次向隋朝派遣使节，密切了与隋朝廷的联系，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在日本实行了冠位制和制定了《十七条宪法》。随同遣隋使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回国以后，也积极提倡实行改革，不少留学生都成为日本进行“大化革新”的骨干力量。木宫泰彦在谈这次改革时指出：“随着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47 页。

遣隋留学生的回国，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已经达到无可遏止的程度。这时恰好苏我氏灭亡，便以大化革新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表面。大化革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二人曾受教于南渊清安，而高向玄理、僧旻二人任国博士，在大化革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公元 7 世纪，隋朝覆灭，建立起大唐帝国，由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大唐帝国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呈现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吸引了更多邻近国家和民族遣使前来朝贡，使唐朝的对外交往出现了全盛时期，引起了正经历改革的日本倭王政权的重视。曾被派到中国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回到日本后也频频奏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社会的发展，要求能够更加直接地从中国吸取先进的政治制度、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于是日本统治者派遣大批的使节、留学生、学问僧入唐，形成了持续 200 多年的中日友好交往的第一次高潮。

根据日本史料统计，从日本舒明天皇（公元 630 年）第一次遣唐使开始，到宇多天皇停派为止，前后共任命过 19 次遣唐使（其中包括 1 次迎唐使、3 次送唐客使），其间共历 26 代，264 年。这 19 次中，有 3 次只任命而未成行，1 次只到百济未到唐土。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主要使命是密切和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吸取和移植唐朝的优秀文化，交换宫廷贵族需要的珍贵物产。

关于日本遣唐使的记载，日本的史籍如《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远比中国正史《旧唐传》、《新唐传》来得详尽。首先日本朝廷对选派遣唐使是十分重视的，每次任命的正使都是朝廷四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 61 页。

位以上官员，副使是五位以上的官员，使团成员除正副使外，还有判官、录事等，有时尚有持节使和押使。另外，随员有船匠、医师、翻译、史生、画师、音乐长、乐手、射手以及各种工匠、水手。初期每次一二船，每船约载 120 人，以后规模不断扩大，每次 4 船，总人数达 500~600 人。有时同行的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日本朝廷对使节出航的仪礼是十分讲究的，天皇往往设宴相送，授刀赠诗，祝福使节旅途平安，早日回返。遣唐使团回国后，又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给予优厚的嘉奖并提升官职。

在中日友好交往的第一次高潮中，两国的官员和人民频繁地往来，加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对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当时中国在社会制度以及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准上都处于先进地位，而日本则十分落后，因此，来自唐朝的巨大影响，促使日本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实行变革，唐风在日本盛行。

在政治制度上是以大化革新为开端的。日本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唐朝作为典范。首先，模仿中国历代的做法，规定了天皇的年号，孝德天皇元年为大化元年，这也就是大化革新名称的由来；其次，确立了天皇最高统治地位，“天地生乎万物，万物之内，人是最灵。最灵之间，圣为人主，是以圣主天皇。”按唐制集中王权和整理中央官制；第三，把唐朝的“均田地”直接运用于日本，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公地”“公民”对土地实行班田收授法。第四，按唐制建立国家和地方制度。为培养效忠于统治阶级的人才，按唐朝制度成立教育机构，中央设大学寮，设大学头、助理大学头等官吏，一般都由留学大唐的学生和东渡中国的中国人士担任。开设明经、纪传、明法、书道、算道、音道六科，学习的是中国四书五经《周易》、《周礼》、《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等等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传记和

隋唐律会等等。学生主要是朝廷四位以上官僚子弟。地方设国学，招收国司、郡司子弟。考试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优良者授予官职。另外，还仿照中国实行兵役制度。

在经济上，日本统治者仿效中国隋唐，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提出“食之为本，是民所天，随时设策，治国要政”；“用兵之要，衣食为本，镇无储粮，何堪固守”^①，依照中国方法，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改进农具。到公元8世纪初，日本也开始使用锹、锄、镰等铁制农具；农民种田也从撒种改为插秧，以后又引进了中国龙骨水车。公元829年淳和天皇专门下令，要各地仿制唐制手推、脚踏和牛拉各类水车，用于农业生产；还大力发展养殖业，公元714年朝廷下令仿照中国养蚕，使养蚕事业有很大发展，推动了以纺织为中心的手工业。其他如商业运输业和冶炼业也有相当的发展。

在思想文化上，日本朝廷从统治的需要出发，对于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佛教，给予支持和提倡，使以佛教为中心的唯心主义思想，在思想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对中国传入的儒家学说也极为推崇，把儒家的忠、孝、礼、义作为治国治民的准绳。实行了政教（佛教）合一，儒佛合流。在文化作品上，唐代文学的影响很深，这个时期日本出现了一批精通汉文的优秀人才，出现了一批以汉文书写的作品，如记载日本气候、物产、山川的《风土记》、汉诗集《怀风藻》等，也出现了一批书法家。艺术也全盘唐化，在绘图和雕塑方面也都吸取了唐朝的技艺。当时的艺术是围绕佛教发展起来的。而出自日本艺人的佛像、绘画作品，不论在服装上、面型上以及神态上都反映了唐人的特征和特点。唐乐对日本音乐的影响很大，日本原先只有六弦琴和横笛，唐乐器琴、箏、琵琶、笙、钟、大鼓等传入后，大大丰富了日本的乐台。

《日本书纪》卷二十九。

在生活上，中国唐朝的民间习俗也渗透到日本人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大的方面，日本统治中心京城奈良的建筑，就是模仿唐都长安和洛阳建造的；寺院也仿照中国的庙宇建筑，铜佛也按中国佛像铸成。小的方面，在服装上，不仅朝廷“大礼小礼，并着唐制礼服”，就是平时日本人民也改着唐式服装；饮食上也逐渐唐化。另外医学也以中国医学为基础，发展为“汉方医学”，结合日本国情，逐渐形成本国的医官、医药制度。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如元旦的屠苏酒、上元节的踏歌、端午节的挂菖蒲、七夕祭为牛郎织女祝福、中秋节的赏月宴以及重阳节的登高等等也在日本流行。

当然，这种唐化不是原样搬用，而是通过“引进”，经过消化吸收中国唐朝先进文明，形成日本自己的特色，来促进当时日本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国无邦交 民间交流延绵不断

公元 907 年 唐朝灭亡。从这以后 在中国黄河流域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同时，南方各地和北方山西先后出现前蜀、吴、闽、吴越、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北汉十个割据政权，总称五代十国。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各个割据政权相互混战，大陆到处战乱，统治极不稳定。此时，日本国内形势也趋向恶化，中央集权受到破坏，作为封建制的经济基础——庄园逐渐发达，而掌握着日本政权的藤原氏族，就是大庄园主的代表。在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农民纷纷逃亡，各地都发生武力反抗，形成了混乱局面。这样，两国就中断了国与国、政府与政府间正常的交往。但是两国民间的往来却是畅通的。根据史料统计，从公元 907 年唐朝灭亡到公元 960 年宋朝统

一中国数十年间，中国商船到达日本有正式记载的达 15 次之多，民间往来一直没有间断过。

当时，长江流域江浙地区生产发达，物产丰富，又有一批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有强烈的海外贸易要求。因而中国商船大多数是吴越地区的，他们长期与日本商人有交往，熟悉对外贸易。商船经常利用季风，春夏时由中国出航，秋冬时从日本返回，定期往返于中日两地。民间通商是得到双方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关心的，特别是日本上层贵族，他们需要以中国商人贩运的奢侈商品来满足自己的享受，这就促使民间通商往来有增无减。中国商船一般只能到日本博多港靠岸，当地官员立即报告京都，由朝廷派官员前来收购，货物商品全部运到京都，天皇有时还要过目，然后收藏在内藏署，需要时再拿出来使用，或拿出部分卖给臣下。从中国运去的主要物品是珍奇鸟兽和香药绵绮等高级奢侈品，从日本换回的是沙金和特产。在《日本纪略》、《扶桑略记》、《百炼抄》等日本书籍中都有这方面记载，如中国商人鲍置求将孔雀带到日本、商人蒋承勋把绵羊送给日本朝廷等等。

通商贸易的来往，必然会涉及到其他领域的联系。日本《皇朝类苑》记载着：“自吴越王处越海带来一信，谈及天台智者教五百卷中缺失多卷，据闻日本存书完整无缺，遂令客商钱淑出金五百两购求该抄本，以献国王。”这清楚表明，吴越王从日本得到了有关天台宗经义注疏方面的书籍。在《宝篋印经记》中还有日僧日延西渡中国，归国时带回青铜“宝篋印塔”一座的记事。

公元 960 年，中国结束了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宋朝。北宋朝廷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加强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抓紧经济建设，首先是恢复农村经济，促进手工业、冶炼业的发展，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商业也更为活跃。市场繁荣、商品丰富，加上造船技术的进步，指南针在航海中的运用，推动了对日本通

商贸易的进一步扩大。虽然宋朝建立以后，中日两国仍然没有国家间的正式交往，但是从事对日通商贸易的中国商船与日俱增。据两国史籍不完全统计，北宋 160 年中，中国商船到日本的达 70 余次。

这种民间商船，一般能乘坐六七十人，而且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海技能的提高，增强了安全系数，缩短了航行时间。当时专门有一批从事对日通商贸易的商人，在中国史书中记载有郑仁德、孙忠、周世昌等，日本史籍中记载的有朱仁聪、周文德、周文裔、李元、陈文佑等，他们经常往返于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航线大多数是从浙江明州（宁波）出发，经东海、黄海到达值嘉岛，然后再前往筑前的博多或平尺、坊津、敦贺等港口。因多数是帆船，渡海时仍然利用季风，春夏往，秋冬返。为此，不少中国商人还在日本这些港口修建自己的宅院，日本有的地方也专门设有接待宋商的迎宾馆。商船运送的货物，一般带到日本的多数是以日本贵族、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和消费品为主，如香料、绫罗丝绸、磁器、绘画、染料、药材，有时也运去鸚鵡、孔雀、水牛等珍奇鸟兽，书籍和生产工具是附带品。从日本运回的主要是沙金、水银、硫磺等原料以及泥金画、贝壳镶嵌的漆器、琥珀和水晶念珠以及扇子等工艺品。

到了南宋时期，中日通商贸易情况有了改变。当时日本武士阶层兴起，在公元 11 世纪以后改变了过去封建贵族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奖励海外贸易，积极开展日中通商，谋求与宋朝的友好关系。在平清盛任太政大臣后，还专门在福原山庄接见宋商，允许宋朝商船直接驶入濑户内海，依靠兵庫港码头，改变了过去中日贸易只限于太宰府一地的规定。日本的通商开放措施，也改变了过去只限于中国商船开航的局面，日本船只也开始航行中国从事贸易。《宋史·日本传》有这样的记载：“……风泊日本舟至明

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 “……泰州及秀州华亭县复有倭人为风所泊而至者，诏勿取其货，出常米赈给而遣之。”随着日本中央政权逐渐为平氏家族所控制，日本的对宋朝贸易也为平氏所垄断。据日本《平氏物语》记载，平清盛当时拥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所不有。”

南宋对日通商贸易中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把大量宋币输入日本。日本出土的中国文物中，除宋瓷外，宋币最多。考据其原因是：宋朝商业很发达，货币是交换的必需，因而铸币业也就迅速发展。当时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包括日本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需要量日益增大，而这些国家冶炼能力满足不了需求，为了维持信用，求助于从宋朝输入宋币以解决交换媒介。这就使宋朝铜钱外流剧增，外流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通商贸易的船只运到日本，并在民间广为流通。据史籍记载，公元 11 世纪后叶和 12 世纪，宋钱在日本民间泛滥，几乎成了当时日本市场主要的交换媒介。

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两国在其他方面的相互影响也不断加强。宋朝的印刷业极其发达，雕版印刷的《大藏经》、《太平御览》以及其他书籍运到日本，雕版技术也传播过去，促进了日本文化事业的发展；纺织、建筑技术在唐朝传入的基础上，宋朝新工艺又传入日本；中国肖像画在日本风行；中国的饮茶习惯也在日本开始盛行；特别是日本的陶瓷业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传说日本制造陶瓷的祖先藤四郎渡海到达中国，在中国制陶瓷的能工巧匠的指点下，他勤学苦练掌握了制作工艺。回到日本后，在山甲郡濑户村发现了生产陶瓷的优质粘土，他在这里建起烧窑，烧出了日本第一批优良瓷器和陶器。现在在濑户还建有陶瓷之祖藤四郎的纪念碑。这个时期日本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对中国也有不小

影响，从日本输入的日本扇子，在宋都汴梁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品；日本刀也是宋人珍视的物品；日本的镶嵌工艺、描金漆绘以及刀的冶炼技术也传授过来，为宋人所掌握。可以说，两宋时，中日民间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五代以来，特别是两宋时期，中日之间所保持的长时期民间贸易、文化、人员等方面的来往，虽然与隋唐时期相比并不太引人注目，但恰恰就是这种民间的友好往来，反映了中国和日本交往史中带有根本性的优良传统。

在南宋末期，中国蒙古族兴起，成吉思汗建立了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当时，与蒙古帝国——元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亚欧，但隔海相望的日本仍未与统治着中国的元朝廷通好。为此，1266年忽必烈遣使日本，国书中要日本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通和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但日本以“书辞无理”为由回拒。以后元朝多次遣使，有的被拒绝，有的元使被日本政府杀害。1274年及1281年，忽必烈分别发动两次侵日战争，即“文永之战”和“弘安之战”，两次都失败撤兵。战争影响了两国的长期友好关系，虽然民间交往仍然存在，但已不如以往那样密切。《明史·日本传》开头就写道：“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事具前史。惟元世祖数遣使赵良弼招之不至，乃命忻都、范文虎等帅舟师十万征之，至五龙山遭暴风，军尽没。后屡招不至，终元世，未相通也。”

双重隐患 倭寇之乱与明日战争

公元1368年元朝被推翻，朱元璋建立明朝。由于连年战火，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社会很不安定。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其统治，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变紊乱局面。在国内，政治

上加强中央集权，统揽军政大权，进一步发展了专制主义；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命令军队垦荒耕田，改善小手工业者地位，扶植手工业发展，使经济得到恢复，国力逐渐充沛。在国外，进一步加强睦邻友好关系，先后向邻国派出使者。特别是在公元 14 世纪初，除朝鲜半岛外，中国大陆北方沿海地区出现了日本海盜即倭寇的骚扰，明太祖更迫切地希望通过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来共同制止这种骚扰，遂多次向日本通使。公元 1401 年，足利义满派遣使节，向明朝廷呈递国书，正式修事两国间的国交。当时明太祖已故，明成祖在位，他派遣中国使节送日使归国，带去了礼品和国书，称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从此两国间一直保持着较密切的使节往来。日本室町幕府与明朝恢复国交后，政府间的贸易又开展起来。当时日本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当权的将军们和上层统治者，只有依靠对外贸易来获取巨大的利润，以满足他们的无度挥霍和穷奢极侈的享受。为了能与明朝保持贸易，获取巨利，足利义满不惜在与明朝廷的交往中自称为“臣”。公元 1406 年两国订立了“永乐勘合贸易协议”。这种政府间的勘合贸易，也叫朝贡贸易。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等价的贸易，日本以朝贡的名义把自己的产品无代价地献给明朝皇帝。而明朝宫廷接受这些贡品后要回赐给几倍甚至于数十倍的物品，而且还要允许日本在中国出售随贡品运来的其他物品。这样，日本统治者以朝贡名义进行的贸易，能得到极大好处，牟取暴利。

当时，从日本输入到中国的货物主要是刀剑、硫黄、苏木等，从中国输出的物品主要有生丝、绸缎、药物、陶瓷品、书籍等，另外铜钱也是中国输出品之一。《明史·日本传》记载：“日本遣商人来易铜钱。”日本《善邻国宝记》也记载，公元 1454 年，日本使节东洋允彭曾要求明朝廷资助铜钱：“永乐年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公库孳然，何以利民，钦待周急。”公元 1475 年，足